



托克维尔传

〔英〕拉里·西登托普 著
林 猛 译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托克维尔传

〔英〕拉里·西登托普 著

林 猛 译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克维尔传/(英)西登托普著;林猛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3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09743-7

I. ①托… II. ①西… ②林… III. ①托克维尔,
A. (1805~1859)—思想评论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41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托克维尔传

〔英〕拉里·西登托普 著

林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43-7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32.00 元

Larry Siedentop

TOCQUEVILLE

© Larry Siedentop 1994

“TOCQUEVILLE,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这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前 言

常有人说，卡尔·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未来提供了最为雄辩却又截然不同的两幅图景。果真如此的话，今天似乎更多属于托克维尔，这位法国自由派贵族如果看到近来的潮流——虽然并不稳固——转到了整体性国家、一党统治和指令性经济的反面，大概会感到高兴。在 1840 年代，他初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就认为它过于感情用事，而更加不能接受的是它的保守——因为它试图发扬光大的，是托克维尔眼里法国旧制度的一项危险成就：权力的集中。

现代民主最重要的一部论著，《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竟是出自一位法国贵族之手，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而托克维尔对官僚或政党组织统治的谴责，也有人疑心是出自贵族的妒忌。但托克维尔为自治和分权所做的敏锐而有力的辩护，却是至今无人能匹敌的，难怪他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样的同代人也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托克维尔关注的不只是权力，他有自己的道德远景——这一远景征服了众多读者——在托克维尔

看来，真正自治的民主社会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可以让我们超越看似无可逃脱的现代生活的商业主义。

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是对治理的参与，这是完满道德生活的一个条件。他一生的写作就是一次痛苦的抗议，抗议生活过度的“私人化”，抗议人们对公民权价值的忽视。就此而论，他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亦即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只是，今天的自由主义回答这一挑战了吗？一种把生命限制在商业活动和私人朋友圈子中的学说，且不说能否使人高贵，就已经足够了吗？托克维尔的挑战仍摆在那里。

在国家形式、不同社会状况和道德危害三者的关系上，没有哪位政治思想家能揭示得如此出色，然而，托克维尔在现代政治思想传统上的地位，却不稳固得令人吃惊。原因何在？可以想到的有两个：首先，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属于现代早期的伟大政治哲学家不同，他的论证不是从明确的人性假设出发，然后进行逻辑的推演；再者，他也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 19 世纪晚期的理论家不同，无意去建立什么新的社会的科学，无意以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长篇大论来开始他的作品。事实上，若把他与那些以“科学性”自诩的思想家并列一处，托克维尔更显得像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生动形象，直抒胸臆，而且饱含情感，他毫不掩饰自己希望打动读者的心灵。就以他最偏重历史的一部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而论，它同时也是对当时的信仰和习惯做法的痛苦批判，正是这些信仰和做法使人们默然接受了路易·拿破仑的帝国。

托克维尔的论证风格，属于一个职业化之前的时代，也属于前资产阶级的时代。他诉诸价值——首推自由这一“神圣”价

值——的方式，几乎是完全私人性的。虽然他尽力与不同类型社会——无论是贵族社会或是民主社会——的习惯和观念保持距离，而且做得非常之好，简直让人吃惊，但他却并不克制自己对贵族社会所培育的优雅、团结及个性的丰富等品质的倾慕之情；而对民主社会的商业精神熏陶下养成的庸人心态，即使更符合正义，他也不加掩饰自己的极度轻蔑。不过，托克维尔带有的贵族的骄傲，却是一种经过净化的骄傲，他绝不陶醉于贵族社会所谓审美上的吸引力；相反，对这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的空虚、残忍、自欺欺人，他是迄今最为严厉的批评者。

托克维尔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使他对基督教西方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分析和评判，既未落入历史决定论的陷阱，又没有陷到实证社会科学主张的虚假的中立性中。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位置？托克维尔是如何发现这一位置的？以托克维尔研究的现有全部进展而论，这些问题仍是至关重要、也有待我们回答的。

本书就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写作过程中，笔者曾从约翰·巴罗（John Burrow）、戴维·伊斯特伍德（David Eastwood）、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福格斯·昂戈德-托马斯（Fergus Ungoed-Thomas）诸先生的评论中获益。毋庸赘言，对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他们无须负责。

拉里·西登托普

基布尔学院

牛津

1993.7

引文说明

涉及托克维尔著作的大多数引用，均是依据新版的全集。该全集在迈耶（J. P. Mayer）和托克维尔著作法国国家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于1951年开始出版。有时某卷会包含不止一册，我分别以a、b、c来表示，比如第一卷第一册标示为Ia。法语的翻译多出自我本人之手，不过《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段落我多采用已有英译文，尤其是乔治·劳伦斯（George Lawrence）的译文——他的译文总体而论优于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译文，即使后者先后得到了弗兰西斯·鲍温（Francis Bowen）和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的修订。如有可能，我也尝试对他们的翻译略作改进。

目 录

引文说明

第一章 在恐怖统治的阴影中	/ 1
第二章 1820 年代的大辩论	/ 24
第三章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5）	/ 48
第四章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1840）	/ 80
第五章 宗教和社会结构	/ 112
第六章 《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回到原点	/ 131

后记	/ 161
----	-------

阅读建议	/ 171
------	-------

索引	/ 176
----	-------

第一章 在恐怖统治的阴影中

1

法国革命后不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诺曼底贵族家庭。不过，自幼年开始，他就与这种家庭背景所持有的种种偏见保持了距离。他相信贵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在西方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他称为“民主社会”）。这样的信念使他避免了他的许多阶级同胞在 19 世纪初受到的道德诱惑。还在青少年时期，托克维尔对自欺就怀着深深的厌恶；对于生活在幻觉之中的贵族同胞，尤其当他们把民主的到来看作一件偶然发生、可以逆转、甚至是邪恶的事情时，他产生的只有同情，如果不是轻蔑的话。他对将来的恐惧那么强烈，除了心智的清晰、意志的坚定以外，很难再去相信别的什么。

托克维尔意识到，民主社会包含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要求，它自身与人们对正义的要求相吻合。不过同时，它带来的严重的道德与政治危机，也需要人们正视并加以克服。由此，一位法国贵族青年居然找到了一项合适的、初看却有些意外的职业：找出这些风险所在以便加以克服。这真是“位高者任重”（*noblesse oblige*）的一种绝妙形态。

托克维尔的结论从何而来？他早年的生活环境给出了一些线索，在他 1805 年出生的时候，周围环境非同寻常。恐怖统治时

期，他几乎全部的家族成员——外祖父母、姨妈、表兄弟——都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双亲，托克维尔伯爵及其夫人，有一段时间也在监狱里等候处决。这一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父亲埃尔韦才 24 岁就头发变白，母亲则精神失常。罗伯斯庇尔下台²以后，两人曾试图重建旧制度下的生活，但十分勉强。无论是韦尔讷伊庄园外部的社会，还是庄园里的挂像，周围的一切都让人回想到内战，还有对贵族的极端仇视。

但埃尔韦没有像当时许多法国贵族那样移民出境，于是乎他又成了富翁，他从那些被砍了头的亲戚那儿继承了遗产。但对于一个数世纪以来一直遭逢坎坷的阶级，财富无法打消它的焦虑。在革命结束后的法国，还会有贵族们的容身之地吗？当托克维尔还是孩童时，就感受到了这种焦虑的压迫。

回过头，看看当还是妈妈怀里的婴儿的时候，外部世界最早是怎样投射在他心灵那面还显模糊的镜子上的；想想最先是什么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听听最初那使他潜在的思考力量得以唤醒的话语；最后，注意一下他必须承受的那些最先到来的斗争，这样你才能理解终其一生都主宰着他的那些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源头。摇篮里已经躺着整个人生了。{《全集》Ia. 26}

《论美国的民主》开头几页的这几句话，透露了真相。托克维尔轻易不会相信外界的仁慈。外部的威胁，虽然最初仅有微弱的苗头，塑造了他的脾气和性格。根据大家的说法，儿时的托克维尔任性冲动，但又戒备心强，潜在具有幽闭恐惧症的倾向。他

对自由的爱好，虽然一开始只是表现为单纯的喜欢冒险和“逃避”，能够从他早年的经历中得到说明——这种爱好恰好证明了背景环境的让人焦虑。

内战的幽灵盘旋在他的脑海。托克维尔承认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有很多年，他的内心一直被监禁或流亡的念头占据。

我想着要考虑一下入狱的可能……过去的四十年表明，事先为此做好准备并不可笑。我对恐怖之地为自己设想一个还算不错的安排：一个受着监禁的人，有了书、纸和笔，该能够找到打发日子的办法。{《全集》Va. 49}

这样的惊惧让他对环境分外留神，希望有备无患，因而毫不足怪，他在青少年时就对那个用暴力在法国废除贵族制度的中产阶级社会表示出一种早熟的兴趣。他最为驾轻就熟的，是理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的想法和感受；这种最初为了避开危险而培养起来的兴趣，逐渐演变成一种技艺和信念。

十六七岁的时候，托克维尔就深感旧日贵族与法国社会其余部分的隔绝。早年（1821—1823年）的通信表明，他那时就担心贵族的傲慢会给他们带来另一场灾难。拿破仑的下台、波旁王室的复辟，使许多从前的流亡贵族想恢复他们的阶级特权。十六岁，他进入梅茨皇家学校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感觉到了中产阶级对于他的阶级的不信任。他越出常轨，与一位家境普通的同学欧仁·斯托费尔斯交上朋友。很明显，托克维尔内心感到一种需要，要与法国社会的其余部分进行接触。

很快，这种内心的需要找到了一种理想的形式。这是因为，随着年青的托克维尔对家族历史的了解，他发现了一个神话——外曾祖父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马勒泽布出生于显赫的穿袍贵族家庭，在革命前的法国曾是一名最勇敢的改革家。青年时他就继承了父亲在税务法院的世袭领袖职务，并在 1760 年代对专制的王室权力做了谴责。

马勒泽布的态度，得益于几十年前在贵族对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创建的官僚国家的反击中，孟德斯鸠和布兰维利耶所发起的攻击；但彼此又有不同。马勒泽布对启蒙哲学家“生而平等”的说法表示同情，从中推出了对政府的新看法。到 1770 年代，当税务法院被解散时，马勒泽布要求的不仅仅是恢复对王权的传统限制，还要求人民的自治。他在 1775 年致路易十六的抗议书，成为他的曾孙最钟爱的读物：

任何一个公民单位或社会都保留有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王国最初始的宪章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追溯得更远：它是一种自然权利与理性权利。但是，陛下，它从您的臣民那里被夺走了。我们要冒昧地指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像顽劣的儿童一样不知节制。

自从那些掌握权势的首相们定下了政治上的原则，
4 不允许召开全国会议以来，事情一步步恶化，以至于现在，如果未经总督的授权，村民们的审议也被视为无效。{《全集》Ia. 447}

这种看法，已经使马勒泽布超出了许多启蒙哲学家开明专制的主张。1774年，他参加了杜尔哥的革新派政府，但当它的种种努力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不果，他便辞职了。旧制度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是在自我放逐之中度过的，转而为新教解放和合法离婚这一类的事业写作。

马勒泽布1789年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把青年托克维尔的想象力给俘获了。1793年，马勒泽布自愿在国民公会上为路易十六辩护，由此展开了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他本人、进而几乎全家的死亡。（同年，马勒泽布的孙女路易丝嫁给埃尔韦，一个外省诺曼底贵族的后裔。他俩得以幸免，仅仅是因为在他们刑期的前几天，罗伯斯庇尔垮台了。）在成为专制王权的主要批评者之后，又为国王辩护，马勒泽布这种行为表现出来的无私，赢得了他曾孙终生的热爱。“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托克维尔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有这样的话，“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不会忘记。”

托克维尔脑海里形成了一种“真正”的贵族的观念：它更多关乎动机的纯正，而不是等级的偏见。他的堂兄弟凯尔戈莱与他抱着同样的梦想。才十几岁，两人就都梦想着法国贵族会变成人民的领袖而不是敌人——就像他们知道的英国贵族那样，为共同的权利、为限制王权而斗争。托克维尔一直想访问英国，想看看那些英国“无赖”，原因很可能就在这儿。

托克维尔早期的教育被托付给了一位慈祥而风趣的老教士勒絮尔神甫，在他那儿，托克维尔得到了母爱的替代，因为托克维尔伯爵夫人得病后极为难处，两人已经疏远。托克维尔和神甫非

常亲近，神甫给了男孩异乎寻常的自由，鼓励他文学的兴趣，滋养他对宗教的虔敬。他们无所不谈。和神甫在一起，托克维尔慢慢喜欢上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思想和情感，这影响了他以后对友谊的看法。“亲爱的路易，世上值得我们拥有的只有友谊了”，他给凯尔戈莱的信里说，“我品尝过其他各种激情之后，慢慢相信了这一点。”

1819—1820年，托克维尔离开神甫的照管，又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已经做了梅茨的省长，通常让儿子自己支配时间，于是他开始在省长图书馆里广泛地阅读。在这里，在接触到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东西之后，他未加批评地接受下来的信仰就走到了头。这种信仰危机由于他与神甫的亲密关系而尤其令人苦恼，它损害了这种关系，并使十六岁的托克维尔陷入了绝望，此后一直没有摆脱。

直至那时，我都是成长在一个充满信仰的环境中，灵魂丝毫没有怀疑沾染过。但之后，怀疑来了，或者毋宁说是以闻所未闻的力量强行闯了进来，那不是对一事一物的疑问，而是全盘的疑问。我突然有了亲历过地震的人所描述的种种感受：从脚下的大地，四周的墙壁，头顶的天花板，周围的家具，到眼前所有自然的事物，一切都在摇晃。一种沉重的忧郁情绪抓住了我。

{《全集》XVb. 315}

托克维尔对确定性的需要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我以为疑问是我们天性中一种最大的痛苦，仅次于疾病和死亡。”